

## 真情育真识 新路开新境

——《报人孙犁》读后

彭程

编者按：孙犁先生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值此第 24 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我们特刊登彭程为侯军著作《报人孙犁》所作序言，以缅怀孙犁先生作为“文学大师、杰出报人、卓越的副刊编辑”的功绩。作为我们前辈报人的孙犁先生，始终心怀人民，始终心里装着读者，始终把为读者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报人孙犁其实是一片富矿，是一处芳草茵茵美不胜收的沃土，你一旦走进，就会陶醉忘归不知返！

同方向进行研究探讨。孙犁先生的道德文章，让人想到《礼记·中庸》的一句话：“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这样一种广博厚积，也为多角度的开掘阐释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孙犁先生辞世二十年来，已有不少研究专著面世，但大都是聚焦于其作品的内容题材、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上，基本上属于艺术和美学方面的阐发。而这部《报人孙犁》，则是别具只眼，选取了一个颇为新颖的研究角度。

这个独特的切入点，就是围绕研究对象的报人身份而展开，敷陈发掘，寻幽探微，条分缕析。这也正是作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的目标——“在‘作家孙犁研究’的主干道旁边，再开出一条‘报人孙犁研究’的新线路”。

纵观孙犁先生一生，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以报人的职业安身立命的。从抗战时期加入晋察冀通讯社、冀中导报开始，他就有了这个身份，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天津日报》工作，并在此岗位上离休。因此，用“报人孙犁”来概括其生平，可以说是准确恰当。这也是孙犁先生在作品中，以及与友人的信函和交谈中，多次为自己所做的定位。

这个视角，与大多数的孙犁研究者的立足点相比，便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一些与众不同的感受和憧憬，从这个角度更容易产生，更有助于对研究对象获得一种全面、清晰和深入的把握。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身就是一位资深报人，未及弱冠之龄就进入报社，数十年间，先后做过记者、编辑和报社领导，熟悉报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流程。这样，他谈起报纸运作的方式，就没有隔膜之感，更能够切中肯綮。还有格外重要的一点，作者曾经供职的报纸，正是天津日报，因此得以成为孙犁先生的年轻同事，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亲炙警教，同聆教诲。后来他虽然远赴南国工作，但与孙犁先生的联系一直不曾断绝，日常书信往来，佳节探望问候，成为一对情感贴近、灵魂契合的忘年深交。

这些因素的凑泊，让人联想到佛家所谓因缘和合，注定会作用于这部著作的构建，让人有理由对它寄予某种期待，而它的确也没有让人失望。目光每于常人忽略处有所发现，于常论未及处有所拓展，是我初览书稿之后的一个突出感觉。说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开辟了一处新境，并不是夸张矫饰。

这部专著共分为四辑。前面三辑中的数十篇文章，分别归列在“读者·记者”“编者·作者”和“学者·报人”的标题之下。这三组六个称呼，是作者为孙犁先生的身份所做定义的集合。

细分起来看，这三对身份，既是按照研究对象生平的时间顺序，加以敷陈展开，也是依据其职业与知识构成，进行探幽析微，显现出的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打量和把握。

“读者·记者”一辑，展现了孙犁先生步入报人之路的身影足迹。青年时代的他，是一位痴迷于《大公报》副刊的读者，并由此爱上了文学，“由读而投”，写文章投稿。敌寇入侵，抗战爆发，他投身保家卫国的民族抵抗运动，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许多报道，记录了血与火的晋察冀战场，讴歌了中国人民的不屈反抗和英勇牺牲。《以笔为枪的战地记者》《我当记者》——在孙犁自述中的“记者生涯”等篇目，生动地记载了这一段生涯。可以说，孙犁先生的文学之路，是从后来写作开口的。《荷花淀》《风云初记》等文学名篇的题材来源。

这一组文章在介绍孙犁先生的记者经历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不同时期新闻作品的特点，一些地方发他人所未道，新意鲜明。像对其《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称为“沉浸式的战地体验”，而对其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津门小集》系列报道，则概括为“渐变式新闻特写”。这样的发现和提炼，如果不是熟悉新闻工作规律、深谙个中三昧者，是难以做到的。报人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编采合一”，即外出时是写稿的记者，在家里时则是编辑的编辑，分工并不十分严格，一直到现在都大抵如此。第二辑《编者·作者》聚焦于这个方面，对作为编辑的孙犁先生的职业操守和卓越造诣，给予了充分的介绍。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在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地，孙犁一身二任，既作记者写报道，又当编辑编报纸和期刊。《孙犁的“编辑部”》《回望“冀中一日”》等篇章，记录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情形。当时环境极其艰苦，他衣食不继，萍踪不定，甚至有很长时间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老乡家的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就是编辑席。（《人在稿存》中写道，孙犁先生将稿件放在装在书包里，一有情况背起就走，没有丢失过一篇稿子。在当时动荡不已、生死无定的情况下，这实在是难以想象，难怪孙犁先生曾经在散文中以自豪的口吻谈及此事。某件事情能让一个人以自托的，足以证明它在其人心中重要性。作者不由感喟：“将稿件与自己的生命‘捆绑’在一起，这样的编辑，乃至他所体现编辑态度和认真敬业的精神，如今安在哉！”

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先生长久担任《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后升任主管副刊的编委，一直到离休。他尽管资格很老，是老革命、老延安、老干部，但丝毫无意于仕进之途，甘愿居卑处微，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所挚爱的编辑工作中。这是他的夫子自道：“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编辑五题》一文，详细列举了他始终践行并要求同事们遵循的编辑工作准则，每一点都来自躬行之中的感悟，是诚意和心血的凝聚。他认真阅读每一篇投稿，“像写信那样写退稿信”，并从中发现和扶植籍籍无名的作者，不少今天声名显赫的知名作家，也得到过他的及时而中肯的提携指导。他“有思路，有宗旨，有定力，有谋略”，将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

作为一代文学名家，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孙犁先生也为几家著名的报纸副刊撰写了很多作品，其中不少今天已经成为广为传诵的名篇。这一种编者与作者身份的重叠叠加，能够让人解读出颇为丰富的意涵，诸如老一辈文人的深厚广博的修养，关于编撰之间的相互激发促进，关于他通过具体作品示范和印证了自己对于副刊的美学主张……凡此种种，都可以是这一话题领域中的应有之义。

第三辑“学者·报人”，则将笔墨投注于孙犁先生在新闻生涯中体现出的深厚卓越的学术素养与见识。像《一本新闻专著的“传奇”》，记录了他写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的情况，这是解放区第一本新闻专著，具有开创的意义；像《孙犁的“策划文案”》等，则让人看到他到副刊工作的精研覃思。天津日报的多个副刊版面和增刊，其办刊宗旨、栏目设置、风格特色等，都得益于孙犁的倡导和评价，通过具体生动的介绍分析，作者给出的论断让人服膺且钦敬：“不惟勇气可嘉，而且思辨之精粹，文笔之犀利，申论之明晰，谋划之周密，皆为策划文案之典范也。”

孙犁先生的认真谨严，体现在许多细微之处。《敬畏文字》中对校对这样的基础性工作的严格要求，《“标题是一种艺术”》中对文题制作的斟酌推敲，都让人想到《论语》中子夏的那句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些让作者深受

触动：“反躬自省，我们这些延续着办报办刊之文脉，传承着董子弘文之薪火的后来者们，是不是也该从中受到一些触动，进而增加几分对文字的敬畏呢？”这样的启发，同样也会令广大的报界从业者受益。

前面曾谈到，这部专著不属于文学作品研究，但并非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事实上，只要面对孙犁先生的作品，就无法避开必要的文本阐发。像《文言的活用》一文，就分析了孙犁先生晚年散文作品鲜明的语言特色，指出它很大程度上源自古典文学的熏染。因为这些作品大多刊于报纸副刊上，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体现了先生的报人情怀，折射出他关于报纸版面的见解，实际上也与专著的诸多旨趣相去不远。

不难发现，在孙犁先生诸多身份中，占据中心的是“报人”。其他的几种称呼，或者是这个身份构成中的一部分，或者是由它派生和延伸出去。作者将这部专著命名为《报人孙犁》，对全体的读者来说，无疑是种贴心的举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这种考虑。这种运用方式，对全书的架构起到了一种统摄控制的作用，让人想到西晋陆机《文赋》中有关谋篇布局的表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这样的安排，仿佛取得了一种全息照相式的立体效果。作者仿佛操控一部摄影机，上下左右，远近前后，正面旁侧，不断地拉伸镜头，有时扫过一个大相开阔的区域，有时则驻留于某一处局部，乃至某个的细节。每一篇文章，都仿佛是一幅高像素的照片，真切清晰。它们既展现了研究对象的身世足迹，又剖露了其情怀魂魄，迥迥迥然，弘阔而细腻。可以说，作者出色地抵达了自己设定的“报人孙犁研究”这一目标。

### 四

前述三辑中的数十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半年时间里集中写下的，这样的速度让人感慨。与其称它们是“急就章”，不若说是长久的蓄积，借由一个合适的契机，获得了集中喷发，仿佛水库的泄洪闸门提起，汹涌的水流瞬间直泻而下。

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主要的动力，要归结为作者对孙犁先生真挚深切的景仰与敬爱。这种情怀，在第四辑《我与孙犁》中，得到了尤为明确的表露。它是潜隐贯穿于这部著作的全部文章中的一条脉络，仿佛一条迤逦于田野间的小路，步履其上，可以从容观赏两旁的佳风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作者自述，这部《报人孙犁》书稿已经酝酿了三十多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年方二十出头，就曾与孙犁先生就这个选题交流，得到了老人的认可和指点。后来因为事务繁忙、工作变动等，迟迟未能充分开展，但一直持续着对孙犁先生的关注和研究，写了不少文章，收入本辑中的这篇就是其中一部分。它们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和文体也丰富庞杂，但是以印证作者对孙犁先生的情感是一以贯之的，始终不曾游移衰减。

这些文章中，岁月之感交织着知音之慨。《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阳刚之美》《浅论孙犁的报告文学》等，分别发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尽管是发轫之作，亦已经显

露其用心之深和用力之勤；《芸斋的来信》和《孙犁的“签名本”》，则写了作者与孙犁先生的书信往来，写了老人对后辈的欣赏和勉励；《遥祭文星》是一篇泣别之作，深情依依，追思绵绵，读来令人动容。而附录收入孙犁先生女儿孙晓玲的《侯军与父亲的忘年交》，则是经由第三方的视角，佐证了这种交往的亲密、融洽和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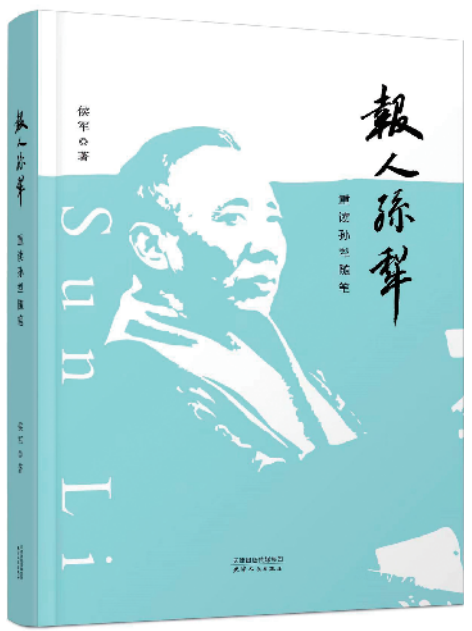
读过这些文章，再回头来看作者的心迹剖白之言，就会感同身受。作者自述，这本书“是我近年来，写得最用心也最动情的一本专著”。他在半年的时间里，“焚膏继晷，精研细思，夙夜伏案，奋笔疾书”，将数十年中的感受和思索，加以整理提炼，一口气写出数十篇，正是为了向即将到来孙犁先生 110 周年诞辰献礼，表达一份深挚的爱戴和缅怀。诚哉此心，信哉斯言。

这样，我们就在本书前三辑与第四辑之间，在过去的和今天的文章之中，发现一种逻辑关联。前三辑的许多基于深入理解的新发现，都是建立在第四辑文章中流淌着的感情之上。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后者是前者的源泉，而前者则属于后者的流淌和漫溢。这一条水流的波光之中，熠熠闪烁的是作者的诚心正意。

孙犁先生一生宠辱不惊，进退从容，得失泰然，“功成而不居，名彰而身退”，但阐发弘扬他的高尚的人格境界、出色的艺术贡献，却是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作品中传播的真善美的理念，对世道人心向善变好的期盼，如今得以通过一位他所信服的作者，经由一部翔实深入的著作，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梳理、阐发和宣扬，使其薪尽而火传，身歿而神存，成为一种精神财富，造福于一代代喜爱他的读者，无疑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于追念之人最好的纪念。孙犁先生天上可知，也当会倍感欣慰的。

在此意义上，作为一个热爱孙犁的读者，我也要向作者侯军先生，表达一份由衷的敬意。

（作者系著名作家、《光明日报》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



孙犁先生是一代文学巨匠，毕生淡泊名利，寂寞自守，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作品凭借鲜明的风格和深邃的功力，铸就了一座文学丰碑，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让人想到苏轼在《答谢师书》一文中援引的欧阳修的说法：“文章如金玉，市有定价。”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今年是孙犁先生 110 周年诞辰，侯军先生的新著《报人孙犁》，便是一部呈献给这个日子的致敬之作。作者自称，它是“作为我这个曾沐浴过孙老恩惠的晚辈，对孙犁先生献出的一份薄礼”。这部专著情感饱满，观点鲜明，资料丰富翔实，论述细密透辟，堪称是一部内容充实、新意迭出之作。

我与侯军先生一样，对孙犁先生的人品、文品景仰之至，以故蒙他信赖，引为同道，囑为这部著作作序。尽管自付力有不逮，但作者感情拳拳，却之不恭，只好勉力而为。此外潜意识里尚有一种期待，也不妨说是一种私念，是想藉此进一步加深对孙犁先生的认识理解。以此缘故，我有幸在该书付梓之前，读过大部分篇章，受益匪浅，感慨良多，所感所思，自以或与作者的初衷相去不远，故不揣谫陋，叙写如下，聊且作为与侯军先生的交流。

对于一个真正的大作家，应该而且能够从不



孙犁先生给侯军签赠新书。侯军 供图

## 文化纵横

### 散文贵在“论”

张斌

看到很多朋友写散文，都十分重视散文的叙事和抒情，却下意识地忽视了散文中的议论，甚至对议论还有些排斥。我想，他们是担心有了议论或者议论多了会影响到散文的审美，削弱散文的文学性。一些散文作品，特别是写景叙事的散文，景物描写优美，叙事也非常生动，结尾一抒情就匆匆结束了。这些文章尽管很美，可读起来总感觉有所缺失，或者不够饱满。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界中的佼佼者。它以真实、自然、优美的语言表达，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然而，散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叙事和抒情，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议论。散文的议论，是指在文章中作者在写景叙事过程中个人感受而引发的议论，或者对于某一话题或者问题的个人看法和思考。这种议论往往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智慧，是散文的灵魂所在。

我国古典散文就十分重视散文中的议论。先秦诸子的散文不必说，唐宋八大家、清代的小品文，几乎所有优秀的散文都是有议论的。而且，这些议论十分精彩，有的还形成了固定的成语。如庄子《养生主》中的“游刃有余”；苏轼《文与可画竹》中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刘基《卖柑者言》中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苏辙《与可画竹》一文，一段“故画竹，先急得成竹于胸”等等……特别是苏轼的《文与可画竹》一文，一段“故画竹，先急得成竹于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

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的议论，说的是胸有成竹及心手相应，讲的是对客观事物及规律的把握。生活哲理上升到哲学层面，文章充满了智慧的光芒，令人赞叹。孙犁说：“中国古代散文，其取胜之处，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其实，中国散文的特点，是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其要求短小，思想要求集中。”他的看法，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特别是强调了“议论”或“说理”的重要。大致说来，诗歌侧重抒情，散文则需要有“议论”的成分。再说文以载道，没有说理，没有议论，很难使散文有深度，也很难出彩。当然，散文的议论，是透过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来体现的，是关照自己，而不是以概念和逻辑关系展开论述，不是学术论文。

也许有人会说，议论性的散文当然要有议论。这种散文是以阐述某个观点为中心的，是借助形象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来说理的。而抒情散文重点就是抒情，叙事散文重点就是叙事，不

必有议论。甚至认为议论会损害文章的美感。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散文是叙事、抒情和议论三者之融合体。就这三个方面来讲，议论可能更重要。议论可以说是人对事物的看法，是作者思想的体现和文章的主题。有了看法和感悟，文章才会得到升华，文章才有灵魂。传统散文中不仅议论性散文要议论，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的议论也绝不能少，即使游记，也会有画龙点睛的议论。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一文，在叙述了游历的过程和所见风景的描写之后，生发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议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探索之路的感悟；只有具备志、力与对物之这三个条件，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这段议论被后人称为《古文观止》中的九大名句，堪称文言文中的巅峰之作。

当代很多散文名家继承了传统散文的议论表达，使散文更有厚重感，更有现实意义。比如

文化大家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作者通过自己的旅行经历，表达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反思。这种议论，不仅展现了作者的广博知识和思想深度，也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和探讨。

散文中的议论是对于社会现象和人类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我们反对那种依附在陈旧的活语框架上，平庸地谈论一些大而无当的公共话题。提倡写出作者源自生活的个人独到的见解和思考。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谢有顺所说：“只有在语言中将自己那充满个性、自由且有锐利发现的感知贯彻出来，将文字引至思想、心灵和梦想的身旁，精神的奇迹才会在语言中显现。”

和深刻的思考。要下很多文章之外的功夫。散文的魅力在于真实，只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才能写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散文。作者需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如果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散文的血脉，那么议论则是散文跳动的脉搏。散文重真实，重真情，但散文贵在有自我，有看法，有议论。议论是散文中来，又统帅了叙事。散文写作要求作者既能够“世事洞明”，又能够“人情练达”，还要把思考的成果巧妙地融合在散文的情与景中，或夹叙夹议，或先叙后议，让读者收获了“感性的感动”，也能够读出“知性的深度”，使文章充满智慧之光。

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悟其实就是看法，就是文中的议论和观点。散文重在议论，议论是散文的灵魂，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智慧。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斯》新版序中说：“缺乏感性经验的感性，只是一种现象，很容易落入滥感。”他讲的就是散文中议论的重要性。先写感性经验，是比较浅的，任其泛滥开去，就很疲软了。而知性的作用，就好比灌溉的活水。感性而知性的结合，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情与理的搭配。可见，散文贵在有议论，不仅得到这位名家的肯定，他还十分注重研究散文中叙事、抒情和议论如何融合。在散文中，议论往往通过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感受、社会现象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探讨等方式体现出来。只有通过恰如其分的议论，散文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体裁，为社会和人类作出更大贡献。